

# 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

林家治  
著



杭稚英

MINGUO SHANGYE MEISHU ZHUSHUAI HANGZHYING

# 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



杭稚英的意义  
在于为中国现代设计史填补了一段空缺，  
更为中国美术史  
续上了一段光彩的篇章。

林家治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 / 林家治著.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12.3

ISBN 978-7-5434-8820-5

I . ① 民 … II . ① 林 … III . ① 杭 稹 英 (1900 ~  
1947) - 传记 IV .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9700 号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http://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责任编辑 / 杨 健 邵 杰 耿 麟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刘冰莹

制 作 / 马 玥

印 制 /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1印张

出版日期 /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4-88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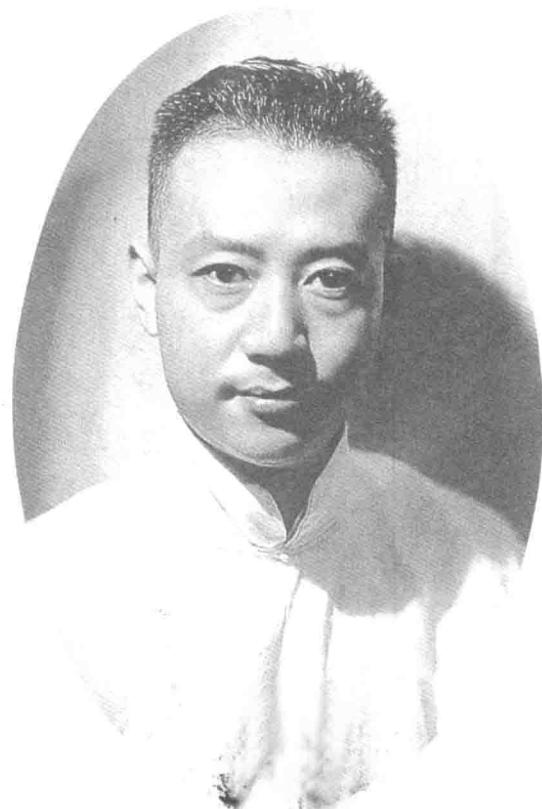
定 价 / 1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     |
|----------|-----|
| 序        | 013 |
| 第一章 少年壮志 | 015 |
| 第二章 学成上海 | 031 |
| 第三章 自立门户 | 053 |
| 第四章 成家立业 | 069 |
| 第五章 慧眼识才 | 083 |
| 第六章 最佳组合 | 105 |
| 第七章 节外生枝 | 137 |
| 第八章 息笔明志 | 151 |
| 第九章 笑傲人生 | 165 |
| 后记       | 175 |

# 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



杭稚英的意义  
在于为中国现代设计史填补了一段空缺，  
更为中国美术史  
续上了一段光彩的篇章。

林家治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作者简介

林家治，生于 1944 年 2 月 11 日，苏州市人。历任战士、宣传干事、科长、副董事长、党委书记。毕业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政管理专业。

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和中国美术史研究。由于持之以恒，成绩颇丰。先后出版《吴有训图传》、《林家治散文精选》等二十余部著作。在美术史研究中，尤其钟情于吴门画派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吴门画派掇英》、《仇英研究》、《仇英画传》、《明四大家研究与艺术鉴赏》（四本一套）、《壮观集》（明代苏州杰出书画艺术家汇观）等著作。其中，《民国商业美术史》一书，曾被评荐为“2008 年度中国十本最佳艺术出版物”。

# 前 言

百年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社会总体结构，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前期，欧美、日本外来和中国本土工商业以城市为基地，构建出丰富的商业文化。正是在具有现代性的城市商业文化环境中，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开展。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直到19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城市繁华，商贾云集，物流通达。对外贸易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十三行”行商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外国人称他们为“皇商”。外来文化艺术透过商业管道渗入中国，影响中国现代视觉文化的兴起。

对外贸易活动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对神秘东方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希望把东方中国的印象以视觉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通过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绘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多描绘南中国事物，或录地形地貌动物植物，或绘世像情态市井风情，或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展现出了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

“外销画”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商业美术品。随着中外商业贸易发展，外国商业美术品，包括印刷图片、画刊画报、商业广告等传入中国，新的绘画题材、新的绘画技艺和新的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他们积极主动学习外来美术，同时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创作出众多描绘世俗生活、商业色彩浓厚的画作。这一时期不少西方画家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居留澳门、香港多年，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的风格技法迥然有异，引起了中国画家、

尤其是从事外销画创作画师、画工的极大兴趣。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一些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更多西方人聚集的城市。对外商业贸易的变化、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印制精美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画师、画工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兼营摄影，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摄影师。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不少摄影师由画家兼任。具有绘画经验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画的方法。照相馆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由于当时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画的制作。外销画、摄影和擦笔炭精画为月份牌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政权的控制，有着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香港经济发展，有着殖民地特征的城市商业文化日益繁荣。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绘制月份牌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开展印刷业务。著名外销画家琳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前期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众多广东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不少广州、香港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商业美术的风气带到了沪上。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1840年即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即清道光二十三年，根据《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上海辟为商埠，中国对外商业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加繁盛，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极高的现代商业都市。

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特色，以销售商品获取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多样的文化和艺术。商业贸易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

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尤其在上海的租界，西方的影响更加全面和剧烈。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的主体，市民文化逐渐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体。上海城市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发展。

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广州是上海的摇篮”。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市民社会、商业社会的形成。有着丰富对外商业贸易经验的广东商人将对外开放新风带到开埠不久的上海。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外国洋行工作，逐渐形成了商业和社会网络。除商人外，不少广东工匠亦来到上海。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沪上，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的社会现象。

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商业文化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

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生发。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印刷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商业美术需求极大增长，创作日趋繁盛。为促进商品销售，不少画家大量绘制月份牌和其他商业绘画，不少商家印制月份牌和其他商业绘画，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国外商品大量输入中国，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图形纹样的图片、年历和商业绘画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

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广泛流行。一些厂商尝试结合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流行的历书、历画印制月份牌广告画，年终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一些外国厂商如英美烟公司甚至开办专门学校，传授“中西合璧”的画艺。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艺术品。

月份牌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商业艺术品。月份牌多画现代商品环境中的时装仕女，反映出城市市民“性”的诉求，亦折射出广大民众的现代化想象。以往以为月份牌最早在上海出现，以为早期月份牌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可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较早、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粤港澳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之初，便有外国商行开始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了解到，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样式或与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由西方的年历画、广告画形式移植而来。

上海开埠以前，苏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苏州人文荟萃，底蕴深厚，不仅影响临近的上海，甚至抵达岭南的广州。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战乱造成“东南半壁无一片净土”，江浙一带的地主官绅、文人学士纷纷逃入上海，促使上海城市人口膨胀，市面繁华。明清时代苏州版刻发达，催生了称为“姑苏版”的桃花坞木版年画。1860年即清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苏州城焚毁严重，不少从事年画创作的画师、画工躲避灾祸来到沪上，他们当中有的人成为绘制月份牌画的重要力量，从来自苏州的画家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生活的城市苏州年画的影响。

月份牌是“中西合璧”的商业艺术品，传统年画影响早期月份牌画，西方绘画则对月份牌画产生更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开展宗教活动，将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孤儿院，被后人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月份牌画家徐咏青等人曾入俗称“土山湾画馆”的土山湾孤儿院学习西方绘画，将西方绘画技法应用到月份牌画的创作当中。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仕女的题材相结合，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杭稚英等画家的努力，月份牌画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据说郑曼陀曾在杭州育英书院学习英文，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城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徐咏青则以水彩画、尤其是水彩风景画见长。他的作品多采用水彩画技法，很少擦笔炭痕，是与郑曼陀画风不同的另外一种月份牌画风格。1913年徐咏青主持商务印书馆图画部时，图画部学生中有杭稚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成绩卓著的商业美术家。这些后起的月份牌画家受民间传统绘画影响较少，接受西洋绘画、照相术和卡通电影的影响较多。他们当中不少人从模仿郑曼陀擦笔炭粉敷色的画风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面貌。杭稚英是众多月份牌画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1923年他开设画室，约请何逸梅、金雪尘、李慕白等人集体创作，由于画稿质量优良、交稿及时，受到中外厂商的欢迎，上海的月份牌画绘制几乎为稚英画室包揽。稚英画室还开展商品设计、商业广告绘制等多项业务。从郑曼陀到杭稚英，月份牌画的面貌越来越成熟，影响越来越广大，形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商业美术创作的高潮。

城市商业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城市商业美术是大众的美术。在一般人心目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抛开成见、面对真实，其实看似对立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异质同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精英美术往往来自大众美术，大众美术往往接受精英美术的影响。雅与俗、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密切互动，从而实现跨越与提升。

20世纪初年，在刚刚兴起的工商业社会和市民文化环境中，月份牌风靡于世，商业美术家名利双收。他们的作品被厂商印制为月份牌分赠客户，印制为商品海报和包装招徕顾客，印制为图画供民众布置家居店堂，书刊画报亦将时装仕女画作为封面和插图……如今为许多人所不屑、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月份牌画，在当时则顶戴“欧美新派画”桂冠，不仅为贩夫走卒所喜爱，亦获得了文人雅士的欣赏。1884年1月25日即清光绪九年十二月八日，《申报》头版刊出题为《奉送月份牌》的告示：“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准于明正初六日随报分送，不取分文。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公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行间，最宜查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堪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毡，无不相宜。伏祈届时赐览为幸。申报馆主人谨启。”

月份牌成为时尚珍贵的礼品在社会流通，不仅市民草根张贴悬挂，知识精英亦彼此相赠；不仅厂商印制，政府部门也印制月份牌供公关之用。收到馈赠月份牌后受赠者往往在报纸刊登启事隆重致谢。1915年12月31日香港《华字日报》载：“本港乌思伦燕梳公司，系朱君寿初经理计阅十余年，得人信仰。兹蒙惠赠月份牌，并此致谢。”1916年12月30日《华字日报》载：“南洋烟草公司洋行先后送到月份牌数幅，壹则美人香草，壹则海角同春，各有可观，合并鸣谢。”1917年1月15日《华字日报》载：“本港宜华大药房及诚德堂奋良氏昨各惠送月份牌数张，又诚德堂并送百胜药油丸饼等物，均甚精良，书此鸣谢。”上海最具影响的印刷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将印制月份牌作为商业竞争的重要手段。1910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新年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特地写信问好，并且“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1916年3月中华书局曾“承印政府月份牌二十万张，印价二万有余”。

对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持商业广告活动，他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1924年，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曾邀请郑曼陀绘制月份牌。潘达微后来编印《微笑》画报亦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潘达微去世后，193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聘请一批传统中国书画家，采用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

标榜“折中派”的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早年曾与关蕙农一起学画，参加过月份牌画的创作。1912年，高剑父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展新美术活动，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设审美书馆，印制销售中西图画、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郑曼陀与高剑父兄弟友谊深厚。1914年刚从杭州来到上海的郑曼陀，便是因参与审美书馆的商业美术活动获得大名，从而在画坛立足。郑曼陀画作之收件处为审美书馆，鬻画价格十分昂贵，审美书馆亦通过印制时装仕女图获利丰厚。1914年郑曼陀为审美书馆作《晚妆图》，高剑父为之题跋；1916年高剑父与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时装仕女图，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仕女。高剑父在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

徐悲鸿的父亲是家乡江苏宜兴颇有声誉的画师，徐悲鸿从小随父习画。1912年，17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他曾以春、夏、秋、冬

为题为审美书馆画了一组 4 扇挂屏，获得报酬 50 大洋，得以度过生计窘迫之难关。徐悲鸿的这组时装仕女画受到市场的欢迎，审美书馆多次以挂屏、明信片等不同形式印制发行。1918 年 1 月《复旦》第 5 期刊发署名刘剑夫的诗：“丁巳秋，友人赠我审美书馆徐悲鸿美女画四幅，余珍而藏之，课余多闲，偶占四绝。一、扑蝶图：频拿玉腕剧堪怜，小扇轻摇舞欲前。一路苍苔幽径滑，蝶迷人倦艳阳天。二、纳凉图：莲花恰好并头开，秋水凝神费想猜。风过画栏香满袖，月明犬吠有人来。三、采菊图：毕竟秋容迈俗群，偶来幽境挹清尘。採归待向郎前问，依比黄花瘦几分。四、寒香图：一天风雪探梅魂，腊屐声声践有痕。娇瘦堪怜无个伴，携来小犬最温存。”

20 世纪初年，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商业文化，时装仕女图画、言情新剧和电影成为“鸳鸯蝴蝶派”商业文化的视觉艺术表现。一些画家如周慕桥等人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高奇峰在广州曾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主编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郑曼陀来到上海以后，高奇峰介绍他为《小说丛报》绘制时装仕女封面画。《小说丛报》是当时上海重要的文艺刊物，除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以外，亦刊有多幅中外名画及人物小影，封面多为时装仕女图，刊有高剑僧《美人玩月图》，郑曼陀《烘云托月图》、《执卷沉吟图》、《拈花微笑图》、《掩卷沉思图》，高奇峰、胡伯翔合作《踏雪寻梅图》等画作，还随刊赠送郑曼陀《美女凭栏图》五彩月份牌画。

这种“恶紫夺朱”的城市商业美术风气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反弹。1919 年 1 月 15 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吕澂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对“此类不合理之绘画”猛加抨击：“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以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海上画工，惟此种画间能成功。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则比比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反容其立学校，刊杂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同期《新青年》刊发陈独秀的文章《美术革命——答吕澂》，更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包括月份牌画、文明戏和林纾的翻译小说的“新文艺”：“至于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它那幼稚和荒谬的地方，和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家译的新小说，好像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要把这三个怪物当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从而拉开了“五四”“美术革命”的序幕。

城市文化与商业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性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的“现代性的消费”。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女裸体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毋庸讳言，为迎合市场需求，获取商业利润，月份牌画家绘制出了众多“肉感”“色情”的女人体作品，然而城市商业美术与新式美术教育体制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画的临摹学习方式。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的多次冲突，学习西方的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了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在此过程中城市商业美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视为商业美术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以往那些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商业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商业美术品，并非全然为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历史证明，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之间存在的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继《民国商业美术史》以后，苏州林家治先生又有《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面世。《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是一部传记文学体裁的通俗读物，力求生动、真实、形象地记述商业美术家杭稚英的一生。书中着重记述杭稚英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创作，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商业美术群体杭稚英画室作了颇为详尽的介绍，不少材料为首次披露。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杭稚英先生的哲嗣、著名画家杭鸣时先生，书稿曾经杭鸣时先生多次审读修改定稿。家属的参与使得《民国商业美术主帅杭稚英》不仅具有可读性，更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像郑曼陀实为1888年出生1961年去世，不少文章著作以讹传讹，或作1884年、1885年出生，或作1959年去世的错误。积沙成塔，聚腋成裘，资料的搜集，个案的研究，对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嘆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对林家治先生独辟蹊径，执著前行，多年孜孜于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历史的研究，成绩斐然，表示极大的敬意。我希望有更多的友朋同道共同参与这一具有意义的工作。

陈瑞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史学者

# 目 录

|          |     |
|----------|-----|
| 序        | 013 |
| 第一章 少年壮志 | 015 |
| 第二章 学成上海 | 031 |
| 第三章 自立门户 | 053 |
| 第四章 成家立业 | 069 |
| 第五章 慧眼识才 | 083 |
| 第六章 最佳组合 | 105 |
| 第七章 节外生枝 | 137 |
| 第八章 息笔明志 | 151 |
| 第九章 笑傲人生 | 165 |
| 后记       | 175 |



# 序

钱塘江，吴越大地的母亲河。

论长度、规模，她自然比不上黄河、长江，可如果论气势，谁也比不上她，全世界只有巴西亚马逊河的涌潮气势可以与之媲美。但那只是媲美而已，媲美之下，亚马逊河自然也会逊色几分。

源自皖赣交界的钱塘江，全长 600 多公里，缠缠绵绵地蜿蜒在吴越大地，朝东一直奔去，出杭州湾便注入了大海。她很温柔，千万年来养育了吴越这块少有的风水宝地。她也很威烈，潮来时势头极猛，可以把石塘顶上 3000 斤重的“镇海铁牛”冲开 10 米以外，也可以一口吞噬两岸的人畜良田，十分悲壮。

相传伍子胥死后，吴王令人将伍子胥的尸体用鸱夷革包裹起来投入江中。对此，钱塘江也感到愤愤不平，便涌起了波涛滚滚的大潮，伍子胥便成了潮神。尽管这只是传说，但人们宁愿相信传说，一代代地流传下来了。

钱江潮，汹涌澎湃，如雷贯耳，成为天下奇观，早在 2000 多年前，西汉文学家枚乘就在《七发》中对钱江潮做过生动描述。从此，吴越人年年观潮。元时，“钱塘秋涛”被列为钱塘十景，年年有“观潮节”，一直延至今天，势头越来越猛。

就在钱塘江北岸，西离杭州 45 公里、东距上海 150 公里的地方是盐官镇。这是个历史名镇。尽管全镇的面积只有 2.34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2.5 万，但历史悠久。早在 2100 年前，西汉时因吴王刘濞煮海为盐，在此设司盐之官而得名。

更令人惊奇的是，盐官镇附近的钱塘江两岸陡然狭窄，地理上呈现出喇叭形状，汹涌的大潮涌来时，潮水猛然抬高，顷刻之间，波峰陡立，峰高有二三米，似一道玻璃的门墙涌来，状如万马奔腾。于是，钱塘观潮，盐官为第一胜。

盐官镇上，筑有观潮台，每年农历八月，这里人山人海，历代文人学士，在这里观潮畅游，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而盐官镇也因此人文荟萃。这里有许多传说故事，其中有一则相传：只要当年钱塘潮涌来时，潮头高出平常之状，盐官一带便会诞生一名大人物了。1655 年秋，钱塘潮比平时高出一米多，盐官人传言，“又要出什么大